

徐松敦煌考察说献疑

李 军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对《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中有关敦煌及莫高窟记载的差异比较,揭示出清代著名学者徐松并未亲历敦煌,更没有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的历史事实。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其考察过敦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关于敦煌及莫高窟的记载和描述,得之于《重修肃州新志》及《西域图志》等官方文献,更得之于敦煌知县许乃穀的《千佛岩歌》等时人著述及碑文收藏。

关键词:徐松 《西域水道记》 敦煌 莫高窟 许乃穀 刘喜海

敦煌学界普遍认为清代嘉道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字星伯)曾经亲历敦煌,并且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①。徐松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也持此说^②,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专家认为《西域水道记》从“稿本到刻本的修订完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徐松的敦煌亲历”,并坚信“徐松确至敦煌”^③。确实,徐松在

①比如冯志文先生在卢秀文《敦煌学编年》一文的前言中说,“对于敦煌莫高窟的历史价值的认识,应当说早在18世纪初,就受到了像汪隆、常钧、徐松、许乃穀等清朝地方官员和学者的注意。他们在游览和考察莫高窟之后,撰文作诗称赞莫高窟壁画雕塑之美”(《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111页)。再如各种“敦煌年谱”、“敦煌年表”、“敦煌历史、文化艺术大事年表”等,均记载“1819年,徐松游览莫高窟”。

②比如长期致力于徐松生平与著述资料搜集整理的清末民初藏书家缪荃孙曾说,“(嘉庆二十五年,徐松)过莫高窟,得周圣历《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元《至正造像记》,于睡佛洞外得唐大历《李府君修功德碑》,碑阴为唐乾宁《李氏再修功德记》”(《徐星伯先生事辑》,《艺风堂文集》卷一,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5页)。后来,徐世昌在其所撰《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十五《徐松传》中,沿袭缪氏之说,而增加了“皆手搨之以归”一语。

③朱玉麒:《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95页。按,朱玉麒先生在文中说“从目前他所留存的诗文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曾经到过敦煌的记录,但《西域水道记》本身的记载透露了这一点”,然后据《西域水道记》关于党河源头的记载、赵吉所云乾隆癸巳岁于“岩畔沙中掘得断碑”之事及沙州城东党河桥的描述等来推断徐松“确至敦煌”。

《西域水道记》中记载和描述了不少有关敦煌尤其是莫高窟的资料,而这也正是中西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徐松亲历和考察过敦煌的重要依据,并在20世纪初一度成为西方探险家和汉学家在敦煌考察时的重要指南^①。由此可见,徐松敦煌考察说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然而,笔者在梳理徐松生平的过程中,对这种说法却颇为怀疑,总是感觉疑窦丛生。而徐松究竟是否亲历过敦煌,是否游览并考察过莫高窟,弄清这个问题,不论对敦煌学研究还是徐松研究而言,都是至为重要的。

一、《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中的莫高窟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有稿本与刻本之分。稿本是徐松“倩人誊写的”,是“徐松手定底稿本”,而“其写定年代,应该在作者从伊犁赐环回到京师之后的道光二年至六年之间(1822-1826)”^②。稿本共四卷^③,关于敦煌和莫高窟的记载,集中出现在卷二《哈喇渚尔所受水》中。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其关于莫高窟的记载:

党河自库库尔图山南复西流,至鸣沙山。山在敦煌县城东南四十里。《新唐书·地理志》:“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肃州志》引《元和志》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皆沙陇,背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还如旧。”今《元和郡县志》无此语。山东麓有雷音寺,倚山为宇。石龕古佛,或塑或绘,不可悉数,故又曰千佛洞。寺经回人蹂躏,残毁太半,龕亦为沙所没,惟唐碑二通尚存,一曰《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一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雍正中,光禄少卿汪澐督修沙州城,有《游千佛洞》诗……山下月牙泉,汉兴道姚培和构亭泉上,常携茶具,载笔来吟,访古遐陬,斯为故实。党河迳山阳,《功德前碑》所谓“前引长河,波映重阁”也……党河自鸣沙山西流十里,至三危山。三危山在鸣沙山西。《方舆纪要》云:“鸣沙山东南十里为三危山。”盖沿高居海《使于阗记》之误。^④

《西域水道记》流传的刻本,“由邓廷桢在担任两广总督任上的道光十九

①详参朱玉麒《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一文第三部分“徐松敦煌研究的后世影响”中的介绍。

②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文献》2004年第1期,第174页。

③《西域水道记》稿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B3869。《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收入该丛书第728册“史部·地理类”。本文所引据影印本。

④《续修四库全书》第728册,第104-105页。按,小字为徐松的自注。碑文的内容,由于篇幅太长,从略。

年(1839)雕版于广州”^①。刻本共五卷,《哈喇淖尔所受水》改为第三卷,其中关于莫高窟的记载改动如下:

(党河)准望盖在鸣沙山之东南也。山在敦煌县城东南四十里。《新唐书·地理志》:“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肃州志》引《元和志》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皆沙陇,背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还如旧。”今《元和郡县志》无此语。山东麓有雷音寺,倚山为宇。山错沙石,坚凝似铁。高下凿龕以千百计,年祀邈远,经历兵燹,沙压倾圯,梯级多断。而佛相庄严、斑斓金碧者,犹粲然盈目,故又曰千佛岩。岩之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乾隆癸卯岁(四十八年,1783),岩畔沙中掘得断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立”,旋为沙所没。《李君碑》即修乐僔功德也……莫高窟又有元《至正造像记》……千佛岩睡佛洞外有唐《李府君修功德碑》,石质坚致,文多完好……其碑阴为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雍正中,光禄少卿汪澐督修沙州城,有《游千佛洞》诗……山下月牙泉,汉兴道姚培和构亭泉上,常携茶具,载笔来吟,访古遐陬,斯为故实。党河迳山阳,《功德前碑》所谓“前引长河,波映重阁”也……三危山在鸣沙山北……党河自鸣沙山西流十里,迳三危山。《方輿纪要》云:“鸣沙山东南十里为三危山。”盖沿高居海《使于阗记》之误。^②

两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的描述,差别极大,甚至有天壤之别。比如,稿本中的“千佛洞”一词,刻本改为“千佛岩”,而关于其名称的缘由和现状,前后说法更是改动极大。再如,稿本“惟唐碑二通尚存”一语,刻本则直接删除,而增加了《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至正造像记》及《皇庆寺碑》的记载,同时对这些碑刻的具体位置也作了明确的补充说明。再如,稿本“至三危山”一语中的“至”字,刻本则改为“迳”,含义就大不相同,而自注“三危山在鸣沙山西”一语,刻本又改为“三危山在鸣沙山北”,并作为正文而移前。

二、许乃穀《千佛岩歌》中的莫高窟

许乃穀(1785-1835)字玉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瑞芍轩诗钞》传

①朱玉麒:《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94页。

②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第148-159页。按,小字为徐松的自注。其中年份的标注,为朱先生整理时所加。碑文的内容也从略。

世^①。据集中所载萨迎阿(1779-1857)《署安西牧敦煌令许君传》可知,许乃穀于道光八年(1828)任甘肃环县县令;九年间皋兰,寻权山丹;十一年冬,调任敦煌县令;十四年冬,调任安西直隶州牧;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心力殫瘁,遘疾而歿,年仅五十一。许乃穀在敦煌任内,祈雨捕虫,通渠南山,开煤矿,修柳桥,还兴学养士,故深得人心,当“讞至敦煌”时,“士民巷哭,为请建祠祀之”。

许乃穀每至一地都会留下一些纪实性的诗作,比如仅就环县任内而言,就有《迎神曲》,记其莅任时率丁胥誓于城隍神前,因有所祈祷,无不立应,故作曲一章,“使童子习而歌之,以酬神佑”;又有《七里沟建桥歌》,记其克服一切困难,结束“环无桥”的历史,从而造福当地百姓之事;还有《留别环人四首》,记其奉调皋兰时环县百姓一再挽留,上官遂准其再留一月,最后离别时出现了“多情父老攀辕意,令我临歧涕泪沾”的感人场面^②。

早在道光十一年(1831)秋,许乃穀在短暂的西域之行后就曾途经敦煌,作《季秋月朔自疏勒还莅敦煌九日苏九斋刺史(履吉)招集月牙泉即席同赋》,其中有句云“天上倒分丹桂影,堤边陡立白沙山。多情坡老茱萸会,一洗尘容绿水湾”;还有《即席次九斋韵》云“如雷出地撼山麓”,并自注云“泉畔沙山矗立以数十,人跻其巅,直下至山腰,便殷殷作雷声,故名鸣沙”^③。而在敦煌的三年任内,许乃穀更是留下了数量不少的诗作,从中不但可见他为官一方时所做的各种造福百姓的努力,还可见他经常去鸣沙山、月牙泉游观的景况。如道光十二年有《渥洼种花词》五首,其一云:“渥洼今号月牙泉,天马生于元鼎年。一瞥玉花千百载,白沙红柳大堤边。”其二云:“我来正值艳阳天,健步移花月窟前。咫尺桂香攀不得,散他红雨到灵泉。”同年,他还有《招鹤篇》,序云:“敦煌城南月牙泉,广卅馀亩,深不测底。沙山壁立其上,时有声自山出,如殷雷,如铜鼓,故曰鸣沙。汉元鼎四年,天马生渥洼水中,武帝作《天马歌》,即此泉也。泉产铁背鱼、七星草,服之长生。七星草历历可擷,铁鱼觅之勿得。往有鹤来集此,二载而去,余始悲其堕落,继幸其冲举,而又望其归去来也,为沿堤遍植卉木以迟之,作《招鹤篇》。”又知道光十三年有《西陲八咏》,其四为《沙山》,云:“非石亦非土,峻嶒叠万重。量来天上斛,转就水边峰。云重金鬢堕,风披宝髻鬆。鸣声出空谷,深夜杂寒钟。”同年,他还有《月牙泉祈雨有应》及《喜雨》,表达了“山水有灵斯感应,吏民无语尚惊猜”的狂喜之情。还有《中秋游月牙泉同闺人泊儿女媳辈分体赋诗得七言古》,表达了在鸣沙山下、月牙泉边

①许乃穀:《瑞芻轩诗钞》,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瑞芻轩诗钞》共收录诗歌四卷,始于己卯(嘉庆二十四年,1819),迄于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后附《瑞芻轩词稿》一卷。该书前有其弟许乃钊的序文、挚友萨迎阿的《署安西牧敦煌令许君传》以及众多时人的题词,后有其里人王研香、长子许道身的跋文。

②《瑞芻轩诗钞》卷三,叶二十至二十二。

③《瑞芻轩诗钞》卷四,叶十二至十三。按,道光十一年六月至九月,许乃穀曾临时受命,随从提督杨芳至喀什噶尔(喀什地区)平定浩罕支持下的玉素普叛乱。故有此行。

“一家如坐西湖船，天长道远情拳拳”的天伦之乐与思亲之感^①。

据上述诗作，许乃穀对敦煌尤其是鸣沙山、月牙泉是非常熟悉的，也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关于莫高窟的诗作，仅见一首，兹转录如下^②：

千佛岩歌并序

敦煌城南四十里有千佛岩，即雷音寺，三危峙其北。山错沙石，坚若铁，高下凿佛龕千百，其中圯者数百，沙拥者数百，危梯已断、不能登者又数百，而佛像如新、画壁斑斓者，尚不可以数计。莫高窟前有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文中叙前秦创建之由及李君修葺千龕之事，纪武氏圣历元年，实唐中宗嗣圣十五年也。睡佛洞外有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文载灵悟法师为李大宾之弟，按其世系，大宾即周李君之昆孙，以故重修。复旁开虚洞，横建危楼，时则庚辰开元二十八年也。按，河西郡县，至德后陷于吐蕃，大中中始复。此碑纪年剥落，惟“十”字、“年”字、“辰”字犹约略可认，天宝后改年为载，大中前正朔未颁，辄以开元断之。碑阴为《李氏再修功德碑》，叙其先赠散骑常侍功德及张义潮时事。其碑建于甲寅，为唐昭宗乾宁元年。莫高窟旁如来窟檐上书“宋乾德八年，归义军节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按，唐宣宗大中五年，张义潮归诚授节，传至张惟深，卒后，沙州推长史曹义金为帅，请命朱梁，仍授归义节度使。周宋间，其子元忠奉表入贡，遥授封爵，至宋乾德只有五年，所书乾德八年，实开宝三年，以其时中外隔绝、朝命罕通故也。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至正十一年建，功德主为西宁王，记文者沙州教授刘奇也。余谓既有唐碑，必有前秦碑，访之耆士赵秀才吉，云：乾隆癸卯，曾于岩畔沙土中得断碑一片，书“前秦建元二年（苻坚年号），沙门乐傅立”，旋为沙压，遍寻不得。盖前秦创建，唐一再修，宋元继之，力大功巨，吁其至矣。爰为作歌，且以是数碑者为金石家所未著录，志乘内亦未搜入，因详及之。

楞伽一朵飞天边，何时堕落三危前。沙石碎剮佛骨出，昌黎先生见应叱。佛骨不见见山骨，我来独游诧人力。人力所到天无功，凿破混沌开洪濛。高高下下千百洞，由颠及麓蜂房通。天梯云栈钩连密，贝多树拥梵王宫。一龕无数佛，四壁无万像。丹黄千百年，斑驳还炫晃。就中一佛耸百丈，天外昂头出云上。一坐一卧大无量，人入耳轮倚藤杖。额珠百斛伊谁拾，慧灯千盏何由集。负此擎天拄地材，膜拜无人自山立。前秦建元穷雕镂，盛唐李氏一再修。继其功者宋及元，千锺万鎰空谷投。有明曾遭吐番毁，山摧石烂沙霾飏。金碧犹馀不坏身，登历依然欲穿趾。呜呼具兹龙象力，何不施之田畴活兆亿？丰碑屹立镇佛国，普佛慈悲作功德。普佛慈悲作功德，我佛闻之笑啞啞。

①《瑞苻轩诗钞》卷四，叶十七至十八、二十五至二十六、二十九至三十一。

②《瑞苻轩诗钞》卷四，叶十九至二十二。

三、徐松并未亲历过敦煌,更未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

嘉庆十六年(1811),时任湖南学政的徐松为御史赵慎珍所纠,次年以“卖书渔利”等九项罪名被遣戍伊犁^①。嘉庆二十四年底,徐松期满赐环。在归京途中的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他手搦了巴尔库勒南山(巴里坤山)关壮缪祠(也称天山关帝庙)附近的唐《姜行本碑》^②。然后,他出南山山口,穿越哈密全境,途经安西、玉门,进入嘉峪关,在这年夏天回到京师^③。正如朱玉麒先生所言,徐松在回归京师后的道光二至六年(1822-1826),对其《西域水道记》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补充,是为稿本。

徐松在稿本中关于莫高窟的记载,究竟源自何处呢?实际上,《西域水道记》的很多地方,大量征引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二年(1737)肃州分巡道黄文炜编撰的《重修肃州新志》的相关内容^④,而关于“千佛洞”的表述,就出现在该书的《沙州卫》中,其“古迹”部分有“雷音寺”条:

雷音寺,即千佛洞,在城南四十里。不知建自何时。有断碑,云唐年重修。疏岩凿石,佛龕层迭无算,其像有装塑者,有绘画者,以数万计,庙宇甚丽。明时回人蹂躏,佛像屡遭毁坏,龕亦为沙所掩,而画壁丹青,尚有存者,今道人等爬梳,略见眉目。四月八日,户民为浴佛之会,香火称盛。^⑤

徐松将此处所载略加剪裁,就成了《西域水道记》稿本中的表述。

另外,稿本提及雍正间的汪澐及其《游千佛洞》诗,并转录了诗作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根据《重修肃州新志》而来的,在该书《沙州卫》中“监督办理官员”部分中云:“光禄少卿汪隆,休宁人,甲戌进士,雍正五年,重修沙州城,建官署、兵房及三堡。”^⑥此外,《重修肃州新志》还专门记载了汪澐《游千佛洞》诗的全文^⑦。

而关于姚培和在月牙泉上建亭之说,徐松显然也是根据《重修肃州新志》而来,其《沙州卫》中“山川”部分“鸣沙山”条下有按语云:“山在州南,积沙而成,党河经其阳,由山之西北流。东麓有千佛洞,山下有月牙泉,沙挟风而飞响,泉映月而无尘,终古光音,仙灵异境。姚观察构亭其上,常携茶具,载笔来

①陈垣:《记徐松遣戍事》,《国学季刊》第五卷三号(1936年9月),第141-150页;后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1-381页。

②《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75-176页。

③李鸿章等纂修:《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徐松传》,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叶六十。按,其云“二十五年夏,赐环”,指的是徐松回到京师的时间。安西州治,即今甘肃省瓜州县城。玉门县治,即今甘肃省玉门市新城区玉门镇。

④徐松称作《肃州新志》,有时又称《肃州志》。

⑤《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第487页。如标点有误,笔者径改。

⑥《重修肃州新志》,第498页。按,汪隆,当作汪澐。

⑦《重修肃州新志》,第555页。

吟,流连不去。”^①而“监督办理官员”部分中云:“承查屯田汉兴道姚培和,江南松江人,癸巳进士,雍正八年,奉委督理沙州户民屯田。”^②

可见,徐松不但据《重修肃州新志》补充了汪澹和姚培和之事,还知道了“千佛洞”在鸣沙山东麓、山下即月牙泉的大致情形。

而在稿本中,徐松就连“千佛洞”的现状、碑刻的遗存乃至鸣沙山的地理方位,都没有搞清楚,以致在表述时出现不少纰漏。比如,关于“千佛洞”名称的来源,稿本云“石龕古佛,或塑或绘,不可悉数,故又曰‘千佛洞’”,这种表述显然很含混,“不可悉数”,究竟大概是多少呢?又为何因此而称“千佛”呢?再如,关于“千佛洞”的现状,稿本云“寺经回人蹂躏,残毁太半,龕亦为沙所没”,则显然不符合《重修肃州新志》所记“今道人等爬梳,略见眉目”的实际情况。而接着,关于碑刻的遗存,稿本云“惟唐碑二通尚存,一曰《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一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这又是何据呢?徐松撰写《西域水道记》等“西域三种”时^③,至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就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纂修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在其卷二十《山一·安西南路》部分中,有“鸣沙山”条,其云:“寺有《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姓氏缺)碑》各一(下略)《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文》(下略)《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缺)碑》(下略)。”^④

因此,徐松撰作稿本时可能据此认为,“惟唐碑二通尚存”。但后来在校订稿本的过程中,他愈感困惑,因为此处遗存的碑刻,远不止这“二通”;而关于“千佛洞”的现状,《肃州新志》明言“画壁丹青,尚有存者,今道人等爬梳,略见眉目”;又关于敦煌的“千佛洞”,与他嘉庆二十一年(1816)在新疆考察时所见克孜尔和库木吐拉两地的“千佛洞”同名^⑤,这又该如何区分称谓呢?再如三危山的地理位置,究竟在鸣沙山之西还是之北呢?所以,在刻本中,徐松不得不作大量修改。

实际上,仅据以上所述情形,我们就已经大致可以断定,徐松并未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况且,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关于敦煌的描述极为有限,并且也是综合各种相关文献而成的,尤其是那些接近目击式的表述如关于党城、敦煌县城等的具体情况,所依据的也仍然主要是《重修肃州新志》等,兹不再赘

①《重修肃州新志》,第482页。

②《重修肃州新志》,第498页。

③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向来以“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大兴徐氏三种”的名义而广为流传。

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52-457页。因碑文内容太长,从略。

⑤《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96页。

述。这都充分表明,徐松不必亲至敦煌、不必目击,即可记载。

而我们再稍作对照就会发现,《西域水道记》稿本关于莫高窟的记载,经过修改后在刻本中所形成的文字,则与许乃穀《千佛岩歌》诗序中的很多文字惊人地雷同。这显然绝非偶然的现象,要么是徐松抄录了许乃穀的,要么反之。那么,哪种可能性更大,或者说更符合事实呢?

笔者遍检许乃穀的《瑞芍轩诗钞》及徐松的相关著述,尚未能发现他们二人之间有任何的来往。但事实上,二人在道光年间的确是“多有交往”的^①。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乃穀与徐松的座师英和、同年严可均及好友周凯、林则徐、继昌、陈善、汪远孙、屠倬等均有交往,并在其《瑞芍轩诗钞》中留下了大量相关的诗歌;同时,许乃穀是许乃济(1777-1839)之弟,而许乃济又与徐松同出英和门下。而据许乃穀长子许道身所撰跋文可知,许乃穀去世后,直到咸丰元年(1851),其原稿曾由许乃济的儿子携带至粤东^②。据此,我们可知《瑞芍轩诗钞》的大致传递过程:许乃穀于道光十五年(1835)去世后,诗稿由兄长许乃济保存,而许乃济于道光十九年去世后,又交给其子保存,最后才辗转至许道身之手。而许乃济去世前的道光十六年,曾在京师任太常寺卿,主张弛禁鸦片^③,他还在《西域水道记》付梓前两年的道光十七年冬与徐松、叶绍本、穆彰阿、姚元之、彭邦畴、祁寓藻等一起为座师英和的《恩福堂笔记》作跋^④。这样看来,徐松从许乃穀本人或其兄许乃济那里获睹许乃穀《千佛岩歌》的可能性就极大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许乃穀抄录了徐松的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一,许乃穀在其《千佛岩歌》诗序中明确说“余谓既有唐碑,必有前秦碑,访之耆士赵秀才吉,云……”,这显然是由他亲自访问赵吉,而此事在《西域水道记》稿本中并没有记载,却出现在后来的刻本中,但也只是说“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可见,徐松并没有说由他访问赵吉。那么,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稿本中没有而在刻本中出现的这些与许乃穀《千佛岩歌》诗序惊人雷同的文字,就应当为徐松抄录许乃穀,而非相反^⑤。其二,许乃穀确

①如张际亮道光七年有《四月三日丁若士履恒大令招同汪孟慈喜孙农部、徐星伯松、陈藩川鸿墀两舍人,徐廉峰宝善、周雪桥仲墀两太史,许玉年乃穀孝廉,集饮龙爪槐院,若士属为诗,漫作》诗(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②许道身跋云:“先大夫中年以前,诗钞甚富。嘉庆己卯仲春,余家不戒于火,戊寅以前之作,十毁其九,己卯以迄甲午,随时删汰,仅存百数十首。咸丰辛亥,先伯兄携原稿赴粤东,令道身等各钞一卷,敬藏笥篋。”(《瑞芍轩诗钞》卷末,叶一)

③《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九《邦交二·英吉利》,中华书局,1977年,第4517-4518页。

④《恩福堂笔记》卷首,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

⑤王冶秋先生曾认为,“他(许乃穀)所谓当地赵秀才云乾隆癸卯在沙土中发现的断碑,系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傅所立。这个碑似未再发现。此事又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许应是摘自松书”(冶秋:《夜读偶记》,《文物》1963年第5期,第55页)。

实是游览了莫高窟的,其中关于如来窟檐上所书、《元皇庆寺碑》之功德主与记文者等的表述,以及诗歌本身的描写,断非凭空虚构的,而诗句也明云“我来独游诧人力”。且这些亲历和目击式的精确表述,在《西域水道记》稿本和刻本中根本就没有,则许乃穀无从抄录有关文字。其三,关于莫高窟的数座碑刻,许乃穀云“爰为作歌,且以是数碑为金石家所未著录,志乘内亦未搜入,因详及之”,也就是说这些资料是非亲历不能得见的。其四,作为担任过三年敦煌县令的许乃穀,对三危山与鸣沙山的方位关系自然十分清楚,他明言“三危峙其北”,而徐松在《西域水道记》稿本中却云“三危山在鸣沙山西”,刻本中又改成“三危山在鸣沙山北”。那么,谁去过莫高窟并熟悉其周边情况,也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其五,《西域水道记》刻本在“(党河)又北流,过敦煌县城西、旧沙州城东”后的“党河自沙枣墩北流十里,当沙州城东,有渡口,缚木为桥,桥频坏,行人病之”之语^①,在稿本中却根本没有。那么,这些表述又是哪里来的呢?笔者翻检《瑞苻轩诗钞》,许乃穀所作《党河柳桥诗并序》,其序云“敦煌城西,党河濠流东北,水湍沙深,为桥辄圯,夏涉水涨几灭顶,冬涉冰凝若蹈利刃,邑人童荣哀家贫,暂建桥而力未逮,仅絙长木于上,今三十馀年,涉者往往颠踣”^②。很显然,是徐松看到这首诗后,才补充到《西域水道记》刻本中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徐松并未亲历敦煌,更未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而后人之所以有相反的认识,根本的原因是未能考察《西域水道记》的稿本,而是根据常见的刻本所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可以说,这一错误判断对敦煌学研究及徐松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中莫高窟碑刻的问题

既然徐松没有到过敦煌,也没有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那么《西域水道记》稿本及刻本中关于莫高窟碑刻的记载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其中唐碑的碑文来源。稿本云,“寺经回人蹂躏,残毁太半,龕亦为沙所没,惟唐碑二通尚存,一曰《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一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可见,徐松当时对这座唐碑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而是受了《西域图志》中“寺有《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姓氏缺)碑》各一……《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缺)碑》……”这一错误表述的影响。实际上,这是完整的一座唐碑,并非稿本所云“二通”,而是“一石两面”^③，“此碑存莫高窟 148 窟前。碑南

①《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62页。

②《瑞苻轩诗钞》卷四,叶三十三。

③朱玉麒先生也说“徐松当时甚至对这两碑为一石两面的情况,也并不了解”(《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第96页)。可惜未能深究原因。

北向……碑额北刻《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碑额南刻《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①。此碑分阴阳两面的真实情况,许乃穀则显然是很清楚的,其《千佛岩歌》诗序云“睡佛洞外有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碑阴为《李氏再修功德碑》”。于是,徐松遂据此补充进《西域水道记》刻本中。不过,许乃穀的《千佛岩歌》中未载录碑文,徐松又是从何而得的呢?并且,在《西域水道记》稿本与刻本中所录碑文是相同的。而我们考察徐松座师英和(1771-1840)在《西域水道记》刊刻前夕所作的题词,就会窥见其中的一些端倪,其有句云“残碑仅足志日月”,自注云“西域汉《裴岑碑》、唐《姜行本》碑率多赝本,星伯皆手拓之;又于敦煌搜得唐索勋及李氏修功德两碑,皆向来著录家所无者”^②。可知,碑文确是徐松“搜得”的,并且在回归京师后曾给英和说起过此事。但时隔二十年之久,英和难免记忆有误,因为“索勋碑”根本就不是徐松在敦煌搜得的(参下文),《西域水道记》稿本中也是只字未提。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徐松在途经安西州治时,有幸“搜得”此“二通”唐碑的碑文拓片。安西州当时下辖敦煌和玉门二县,故徐松在安西州治见到碑文拓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因碑文出自敦煌,英和遂误为“于敦煌搜得”。本文前面说过,徐松撰写《西域水道记》时依据的官方文献之一就是《西域图志》,而其云“寺有《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姓氏缺)碑》各一”,因此,他就在途经安西州时特意寻访,果然如愿以偿。之后,徐松很可能觉得“惟唐碑二通尚存”,再无考察敦煌的必要,加之流放已久,归程匆促,遂径返京师。需要说明的是,徐松在《西域水道记》稿本中据碑文内容,对其名称进行了改正,将《唐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陇西李太宾碑》改为《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而《唐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姓氏缺)碑》被改为《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后来,应当是他见到许乃穀的《千佛岩歌》后,在刻本中又再次进行了修正,将《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改为唐《李府君修功德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改为《李氏再修功德碑》。还需说明一点,那就是此碑实际上在《西域图志》中就已收录,徐松在《西域水道记》稿本和刻本中均据所见拓本进行了精心的补充和修正,而许乃穀在其《千佛岩歌》诗序中却说,包括此碑在内的“数碑为金石家所未著录,志乘内亦未搜入”,可见他也并未详审相关文献,并且也未能见到过《西域水道记》稿本。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刻本中《索勋纪德碑》及其碑文的来源。刻本云“(敦煌)县之黄舍棧星门内,土壁嵌唐《索勋纪德碑》”,并详细转录了碑文^③。乍看

①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1982年第1期,第63-64页。

②《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3页。按,据题词内容,当作于《西域水道记》刊刻前夕,其有句云“十年心力谁鉴之?梨枣流传赖吾党”,自注云“邓嶠筠制军为镂板于粤东”。

③《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63-165页。

一下,如此详细而具体的接近目击式的记载和表述,不正是徐松亲自考察、亲眼所见吗?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徐松曾于道光十年(1830)作《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勋纪德碑跋》一文^①,其首先云“案,此碑诸家均未著录,道光辛巳秋日,得于东门书肆”,然后对索勋的身世进行了详细考证,最后云“燕庭先生以此见示,因题记归之”,落款是“道光庚寅南至日,徐松星伯识”。文中提到的燕庭,即刘喜海(1793-1852),他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金石学家。据徐文所述,《索勋纪德碑》拓本并非英和所云“于敦煌搜得”,而应该是道光元年辛巳由刘喜海于京师东门的书店所得,并在道光十年庚寅才出示给徐松的,徐松看到拓本后,遂将其原来所在地的信息及碑文内容补充进《西域水道记》中。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从徐松的这篇跋文中,再找到他并未到过敦煌的佐证。文中在考证索勋身世时,是以此碑与《宗子再修功德记》及《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互相印证为据的,其云:

碑首云“公讳勋”,“公”字下有“王裕称”三字,文不相属。前《宗子再修功德记》文中亦然,莫明其义,或是唐时敦煌方言有此称谓,阙疑俟考……今据沙州千佛洞《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立于乾宁元年,上距咸通十三年已二十二年,其结衔尚有张淮深……金石之有益史传如此……

这里,徐松称所据唐碑的名称为《宗子再修功德记》和《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与《西域水道记》稿本所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和《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大致相仿,而与刻本所云《李氏再修功德碑》和《李府君修功德碑》则相去较远。这就说明,徐松在道光十年时依据的还是《西域水道记》稿本,也仍称莫高窟为“千佛洞”,而非刻本所称“千佛岩”,并且也不知道此碑位于刻本所云“千佛岩睡佛洞”外。

再次,我们考察一下刻本中《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及其碑文的来源。刻本云“岩之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也详细转录了碑文^②。而这在稿本中根本没有,显然是后来补充进刻本的。那么,徐松是从何得知的呢?据王冶秋先生介绍,此碑“原在敦煌第三三二号窟,今存敦煌文物研究所陈列室。碑早毁破,文亦磨损。现北京大学藏有刘燕庭拓本”^③。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推论,与《索勋纪德碑》一样,徐松也可能是从刘喜海处见到该碑文拓片的,遂补充进《西域水道记》刻本中,其具体时间还不能轻易断定,但关于此碑相关情况的表述,如其位于“岩之莫高窟前”、“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等语,当是徐松在看到许乃穀《千佛岩歌》后补充的。

最后,我们再考察一下刻本中《至正造像记》及其碑文的来源。徐松称,这

① 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徵卷”,民国九年(1920)缪氏刻本,叶二十七至二十八。

②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48-152页。

③ 冶秋:《夜读偶记》,《文物》1963年第5期,第55页。

是元代的一座碑刻,也详细转录了碑文。而从李永宁先生对此碑的介绍来看,徐松确实至少是亲眼目睹了其拓片的。李先生将此碑称作《莫高窟六子真言碣》,并介绍说“碣石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石已残,但正面文字基本完好”,还认为“碣石由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立,奢蓝令梅刻。碣石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①。而这在《西域水道记》稿本中没有任何记载,在许乃穀的《千佛岩歌》中也未见提及。那么,徐松究竟又是从哪里得知的呢?目前,笔者还找不到确切的信息来说明这一问题,但从《索勋纪德碑》拓片在道光元年(1821)就已散播到京师的书店并为收藏家刘喜海所得以及他还藏有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拓片等情况来看,徐松在刘喜海处见到《至正造像记》拓片的可能性也还是很大的。当然,在碑刻争雄的年代,也不排除徐松亲自在京师搜得或者从其他金石家和收藏家那里见到该碑文拓片的可能性。

这里还需补充说明一下,那就是《西域水道记》稿本中只字未提而在刻本中出现的“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一语,如前文所述,也见于许乃穀《千佛岩歌》诗序中,当是徐松所转录,但他因并未目睹其碑,为审慎起见,故将诗序中“至正十一年建,功德主为西宁王,记文者沙州教授刘奇也”数语删去不录。而这数语,恰恰证明许乃穀是见过此碑的,因为在碑阳的第一行明确有“敕授沙州路儒学教授刘奇撰并书丹”之语,第三行明确有“速来蛮西宁王崇尚释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等语,并且此碑与《至正造像记》即《莫高窟六子真言碣》“同为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所立”,而“立碣时代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②。

总而言之,经上述考察可以判定徐松并未亲历敦煌,也并未游览和考察过莫高窟;他在《西域水道记》稿本及刻本中对敦煌尤其是莫高窟碑刻的详细记载,主要来源于《重修肃州新志》和《西域图志》等官方文献,更受益于敦煌知县许乃穀的《千佛岩歌》及刘喜海所藏敦煌碑刻拓本。但徐松的这些记载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敦煌学的研究。而为徐松提供了极大方便的许乃穀及刘喜海等人,也不应被敦煌学界淡化乃至忘记。

【作者简介】李军,博士,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小说、辞赋文献。

①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第108-109页。

②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第112-114页。据李先生介绍,此碑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碑阴还有众多施主的名字。